

新兴世界仍在崛起吗？

二十年光阴荏苒，金砖国家风采依旧

吉姆·奥尼尔

照片：COURTESY OF JIM O'NEILL



若非新冠疫情的影响，过去 10 年的 GDP 增速本应在 3.6% 附近，略低于 2000—2009 年的 3.7%。考虑到全球经济面临的各项挑战，这一增速表现还算不错，与疫情暴发前的市场情绪截然相反。事实上，相较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经济年增速均为约 3.3%），全球经济的每个十年都经历了更强劲的经济增长。数亿人摆脱了绝对贫困，这一程度上得益于所谓的新兴市场引领的增长奇迹，其中我钟爱的金砖四国就位于新兴市场的前沿和中心。

2021 年是我创造“金砖四国”一词的 20 周年纪念日，它概述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经济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及其崛起对全球治理的影响。展望 2021 年的剩余时间及后续年份，世界各国可以对新兴市场抱有何种期待呢？

重新审视“金砖四国”

我的第一篇文章《世界需要更坚固的经济之砖》（The World Needs Better Economic BRICs），旨在充分阐述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理由，而非这些国家未来势不可挡的经济增长。

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我设想了一种可能性极低的情形，阐述了倘若我们所研究的国家充分释放其增长潜力，世界经济将会何去何从？我们运用宏观经济学的标准方法论对此进行了定义，其中实际经济增速由两个变量决定：国家的劳动力规模和经济生产率。考虑到金砖四国的人口规模、相关的劳动力规模以及生产率的追赶（发达经济体的）空间，我们不难看出，金砖国家的潜在增速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我们的研究意图并非显示金砖国家将以其潜在增速持续增长。坦率地说，这并不现实，也不是我们想传达的信息。

在这种背景下，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与第一个十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那段时间里，金砖四国的增长表现优于我 2001 年所阐述情形的预测。虽然印度近年来的经济表现明显不尽如人意，但总体上符合我们预想的路径。然而，巴西和俄罗斯 2010 年—2020 年的经济表现令人大失所望，为此我偶尔调侃，也许该把“金砖四国”改成“金砖两国”。巴西和俄罗斯都遭遇了著名的大宗商品诅咒。有证据显示，两国的可持续发展过度依赖于世界大宗商品周期。尽管两国国情存在显著差异，但它们都需要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摆脱对大宗商品的依赖，增强私人部门的作用。

相比之下，中国经济持续的强势增长表明，其完全释放出了自身的增长潜力。截至 2019 年，中国 GDP 超过了 14 万亿美元，比其他金砖国家的 GDP 总和高出 1 倍还多。中国经济的庞大规模意味着，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目前已超过欧盟，

且正在接近美国。

回到未来

鉴于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人口挑战，其实际 GDP 增速将从 2021 年初开始放缓，但这无法阻止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要使世界经济总体上加速增长，人口结构有利的国家就必须提高国内生产率。

世界经济要达到 4% 的实际 GDP 增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要达到过去 20 年的 3.7% 也极具挑战性。经济增速是否达到我们所需的水平由四个因素决定：发达经济体的生产率；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速度；印度能否成功突围；以及最关键的，是否会出现其他人口众多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越南等国能否释放其长期增长潜力？若可以，世界实际 GDP 增速则更有可能重现过去十年的辉煌。

显然，要在新冠疫情后迅速实现强劲复苏，几乎完全依赖于研发和分配疫苗和疗法以根除疫情。根据我的判断，捐赠国提供的 200—300 亿美元援助将产生巨大的乘数效应，成为有史以来通过的规模最大的显著经济刺激计划，其潜在效益甚至将超过 2008 年至 2009 年的刺激计划。

除了新确立的气候变化的工作重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在鼓励这一刺激计划中发挥积极作用，参与卫生系统领域，并将卫生支出分析整合至监督工作中。与各国财政部长协调一致，为“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器”（全球领先卫生组织之间开展的一项合作）提供支持，只是一个很小的最初一步，各国仍须再接再厉。

作为英国政府抗菌素耐药性独立评估 (AMR) 项目的负责人，我知道还有其他与新冠肺炎具有同等危害性的卫生威胁。到 2050 年，抗菌素耐药性每年可能夺取多达 1000 万人的生命，进而带来 100 万亿美元的累计经济机会损失。一些观察人士认为这一数字难以置信，但新冠疫情让我们意识到，很不幸，这就是现实。我们“新理念”的核心应该是竭力加强经济、金融和卫生领域之间的联系。

更加大胆、更加睿智

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特别是较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必须采取明智的财政政策，即优先开展公共投资的财政政策。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依据来评估实际经济框架和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来说，我们急需将政府的投资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真正区分开来；投资性支出可能产生积极的乘数效应，因此从会计学的角度来看，处理方式应与消费性支出有所不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未来的卫生威胁需要投资性支出。新兴市场经济体能否实现其增长潜力也取决于投资性支出——可以说，相比于融资环境而言，投资性支出对于经济增长更为重要。

构建更明智的财政政策框架，几乎必然需要更稳健的国内金融体系。各国持续依赖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使得上述目标难以实现。尽管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稳步下降，但总体来看，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与我 1982 年进入金融行业时的情况一样。这意味着世界各国都势必会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周期性影响，承受它对美国的影响以及随之而来的全球融资环境变动。若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新兴市场的融资环境会总体收紧，并通常伴随着市场混乱；而若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则会出现相反的情况。

上述问题终会得以解决；总有一天，变革将会发生。我们需要不断调整全球货币体系，以更好地反映全球经济的动态变化，而在此之前，新兴市场国家实现增长潜力仍将面临挑战，尽管相比之下，卫生和教育体系等其他国内举措可能挑战性更强。

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这些问题时，需要更加大胆、更加睿智，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为它们提供援助。FD

吉姆·奥尼尔，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席，高盛资产管理部前董事长。